

16—18 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16—18 世纪喀尔喀蒙古
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齐光◎著

16—18 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18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齐光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8
ISBN 978-7-309-15191-6

I. ①1… II. ①齐… III. ①喀尔喀蒙古-民族历史-研究-16世纪-18世纪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30445 号

16—18 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齐光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35 千

202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5191-6/K·732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16—18世纪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研究

绪 论	001
第一节 历史背景	001
第二节 先行研究	012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018
第四节 史料介绍	024
第五节 章节构成	036
第一章 16 世纪后半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 形成及其在 17 世纪初期的发展	041
第一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形成	043
第二节 阿巴岱汗后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政治 社会体制	046
第三节 从 1596 年“猴年大法典”看七和硕喀尔喀兀 鲁斯的政治社会体制	053
第四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政治社会体制在 17 世纪	
	001

初期的发展	060
第五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与其属民之间的 协商制度	063
第二章 17 世纪前半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 四卫拉特的联合	069
第一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对四卫拉特的战争与 和平	070
第二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四卫拉特建立新政权的 经过	077
第三节 “喀尔喀—卫拉特联合政权”的建立及其 意义	082
第三章 1640 年前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在 卫藏的活动	088
第一节 1640 年前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在卫藏的 活动情况表	089
第二节 1640 年前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在卫藏的 活动情况	092
第四章 1640 年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在 卫藏的活动	105
第一节 1640 年至 1680 年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 与达赖喇嘛往来关系表	106

第二节	1640年至1680年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 与达赖喇嘛的关系	122
第五章	17世纪中后期达赖喇嘛权威下的七和硕 喀尔喀兀鲁斯政治社会体制	151
第一节	五世达赖喇嘛颁发给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 办理事务的噶舒克文书	152
第二节	五世达赖喇嘛颁发给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 册封领主的噶舒克文书	161
第三节	1640—1686年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政治 社会体制的变化	167
第六章	17世纪中前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 清朝的通使关系	175
第一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满洲—清朝的最早 接触	176
第二节	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翼与满洲—清朝之间 最初的通使关系	180
第三节	1640年前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清朝的 关系	184
第七章	17世纪中后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 清朝的“八扎萨克体制”	195
第一节	清朝任命八扎萨克时须七和硕领主会议通过及	

达赖喇嘛的认可	198
第二节 八扎萨克体制下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清朝的 外交交涉	201
第三节 八扎萨克的具体贡数和清朝皇帝的赏赉数	207
第八章 17 世纪晚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服属 清朝的过程	228
第一节 康熙帝向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遣使	229
第二节 对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右翼纷争的调停	233
第三节 服属清朝编立扎萨克旗和旧有体制的关系	242
第四节 服属后册封的清朝爵位与八扎萨克之间的 关系	246
第九章 18 世纪前半期清朝的喀尔喀蒙古保护及其 统治政策	253
第一节 康熙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优待与利用	254
第二节 雍正帝对喀尔喀蒙古的保护与利用	259
第三节 喀尔喀蒙古在清准战争中的立场与作用	268
第十章 18 世纪喀尔喀蒙古四部的政治社会体制	284
第一节 清朝皇帝及达赖喇嘛等颁发给喀尔喀蒙古 四部的敕书及噶舒克文书	286
第二节 喀尔喀蒙古四部的吉谷呼及塔尔哈文书	296

第三节	吉古呼及塔尔哈文书所反映的喀尔喀蒙古四部 政治社会体制	313
第十一章	清朝统治的加强：1783年土谢图汗获罪 事件	332
第一节	清朝以“滥发乌拉执照”为由弹劾喀尔喀蒙古 王公	333
第二节	清朝对“滥发乌拉执照”事件的处置过程	337
第三节	清朝对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的处分	350
结 论		359
附录一	系谱	374
附录二	大事记表	383
参考文献		395
后 记		403

绪 论

本书将利用满、蒙、藏、汉文史料,以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晚期为时间轴,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为主要历史舞台,阐明喀尔喀蒙古的七和硕兀鲁斯体制——从其形成到服属清朝成为外藩及被分成四部后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发展变迁历程。除关注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本身的发展外,主要揭示其与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清朝皇帝和被蒙古人崇奉为圣者的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入探讨服属清朝前后喀尔喀蒙古政治社会体制的变化及其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政治社会体制,是指16—18世纪喀尔喀蒙古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结构及在法的支配下的有机协调的统治体系。

第一节 历史背景

喀尔喀蒙古人,是今日蒙古国的主要居民。关于喀尔喀(Mon: qalq-a)一词的由来,学术界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来源于注入贝尔湖的喀尔喀河(Mon: qalq-a Yool),因该集团游牧于该河流域而得此名。二、来源于蒙古可汗的护卫集团(Mon: qalqalaγči)。三、来源于蒙古兵使用的盾牌(Mon: qalq-a bambai)。此外,据笔者发现,设

有挡箭牌的战车,蒙古语也称喀勒喀(Mon: qalq-a)。不过笔者仍认为,不应将以上名称割裂看待,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15世纪的喀尔喀土门(Mon: tümen,即“万户”)十二鄂托克(Mon: otoγ),大体由巴林、弘吉刺特、巴岳特、扎赉尔、巴苏特、克列特、哈达斤、唐古特、萨尔图勒等成吉思汗时代的“阿亦马黑(Mon: ayimaγ)—斡孛黑(Mon: oboγ)”集团^①构成。以此来看,喀尔喀土门内的诸集团,作为向其直属领主或宗主可汗提供兵役的人员,曾以护卫蒙古帝国宗主可汗及其家室自居。1368年后,随着蒙古可汗朝廷的北迁,他们来到呼伦贝尔西部的喀尔喀河流域游牧居住,最终于15世纪的达延汗时代,“喀尔喀”这一名称固定下来,同时成为蒙古可汗非常倚重的一个政治社会集团。

喀尔喀土门,作为达延汗六大土门中的左翼三土门之一,为蒙古可汗朝政的稳固与扩展,立过汗马功劳。因此,达延汗行诸子分封时,喀尔喀土门奉戴了被认为是继承基业的两个小的嗣子。其中,巴林、弘吉刺特、扎鲁特、巴岳特、兀济耶特五鄂托克,由达延汗第六子阿勒楚博罗特领有。而扎赉尔、巴苏特、郭尔罗斯、克列特、哈达斤、唐古特、萨尔图勒等七鄂托克,由达延汗末子格噶森札统领。阿勒楚博罗特属下的五鄂托克,逐渐游牧至大兴安岭之南,称为“内喀尔喀五部(Mon: öbör tabun qalq-a)”。格噶森札支配的七鄂托克则不断向西拓展游牧地,最终至16世纪中晚期为止,占据了整个漠北地方,从而被称为“七鄂托克喀尔喀(Mon: doloγan otoγ qalq-a)”。后来格噶森札的七个嗣子,即长子阿什海达尔罕洪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三子诺诺和卫征诺颜、第四子阿敏都喇勒诺颜、第五子塔尔尼、第六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萨穆贝玛,先后分领七鄂托克喀尔喀的全部及乌梁罕土门的一部分,形成了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

^① 后来对应的汉字是“爱马克(Mon: ayimaγ)—斡孛克(Mon: oboγ)”,或“爱玛客(Mon: ayimaγ)—敖木库(Mon: oboγ)”。

(Mon: doloγan qosiγu qalq-a ulus)。本书的考察对象,即为此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政治社会体制。

至16世纪中后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中,格呼森札长子阿什海达尔罕洪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六子德勒登昆都伦及第七子萨穆贝玛支系的领主们,逐渐形成了兀鲁斯共同体的右翼。他们不断向西进攻宿敌四卫拉特,将自己的游牧地扩展至阿尔泰山脉地区,以至巴里坤一带。1691年服属清朝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为扎萨克图汗部。而第三子诺诺和卫征诺颜支系的领主们,带领各自属民,驻牧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图拉河流域,发展成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政权的中流砥柱。1691年服属清朝后,成为土谢图汗部和赛音诺颜部。第四子阿敏都喇勒诺颜支系的领主们,服属清朝后单独成为车臣汗部。诺诺和卫征诺颜和阿敏都喇勒诺颜支系的领主们,曾形成兀鲁斯共同体的左翼。每个支系的领主们,皆经常一同召开会盟,制定法律,商议事务。

16世纪80年代,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众领主推举阿巴岱为“赛音汗(Mon: sayin qan)”,并团结在其周围,处理内部纠纷及对外征战、议和等事务。当时,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针对四卫拉特,经过长期战争,将其征服并派遣领主进行直接统治,阿巴岱被推戴为汗的最大理由,可能即来自这一对外战争的功绩。另外,阿巴岱在喀尔喀蒙古历史上被永世传颂的功德是:他于1586年前往呼和浩特附近会见第三世达赖喇嘛,并请得“佛法大瓦齐赉汗(Mon: nom-un yeke wačir qan)”封号,以此在漠北地方首倡信仰黄教。随即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有力领主们,纷纷效仿这种行为,逐渐形成了从达赖喇嘛请求封号的政治传统,这是利用宗教来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利的明白例证。至17世纪初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内各支系的领主们在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共同协议商定的法律基础上,达成了一种联合。

1624年前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四卫拉特握手言和,止息

战争,达成了两大集团的和平。但在同一时期的漠南,蒙古宗主可汗——林丹汗——开始攻打不服从旨令的其他兀鲁斯,致使众多失去归属和家园的漠南蒙古人逃至漠北避难。为抢夺这些逃人及其财产,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内部发生不和。最终于 1634 年前后,左翼诺诺和卫征诺颜支系的领主绰克图洪台吉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其他领主发生大的争执,被迫带领属民南下。而就在同一年,为躲避满洲、漠南蒙古联军的追击,不得不逃亡青海的林丹汗,于甘肃、青海交界处扁都口附近的锡喇塔拉(大草滩)病逝。林丹汗与绰克图洪台吉之间以姻亲及共同的信仰为前提,曾有过密切的书信和使者往来。旋即绰克图洪台吉组织自己的军队,进攻自 16 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占据青海的多伦土默特(Mon: doloγan tümed)^①,将其民众收归己有。其后又派长子阿尔斯兰率兵前往卫藏,打击黄教集团。相反,为消灭此“倒行逆施”的绰克图洪台吉,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右翼部分领主及以固始汗为首的四卫拉特领主,商定出兵前去征讨。

1636 年,满洲宗室领主、漠南蒙古领主及少数汉人军阀,于盛京召开会议,共同推戴皇太极为“皇帝”,并以他为中心建立了“大清国”政权。同时,漠南蒙古的领主们又上尊号于皇太极曰“博克多车臣可汗(Mon: boγda čečen qaγan)”,承认其是蒙古宗主可汗的继任者,以此皇太极具有了统治蒙古的正统性。此事对密切关注漠南动向的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四卫拉特的领主,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637 年,以固始汗为首的四卫拉特联军,于青海中部的今乌兰县附近大败绰克图洪台吉率领的军队,致使其在逃亡途中被杀。随后,固始汗亲自前往拉萨朝见达赖喇嘛,在请得“持教法王(Mon: šaḷin-i bariγči nom-un qan)”封号的同时,极力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蒙古。自消灭绰克图洪台吉至 1640 年秋召开“喀尔喀—卫拉特会盟(Mon: qalq-a oyirad-un čiyulγan)”为止的近三年时间内,以拉萨

^① 青海多伦土默特的领主层,是蒙古中兴之主达颜汗第四子阿尔斯博罗特的子孙。

克图汗素班第为首的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以固始汗为首的四卫拉特的领主们,曾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商讨,计划将五世达赖喇嘛邀请至蒙古。在两次的邀请后,五世达赖喇嘛并没能离开拉萨前往蒙古地方后,固始汗决定出兵征服藏区。经过近三年的艰苦战斗,在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们的协助下,固始汗军队终于将喀木及整个卫藏全部征服。但需说明的是,固始汗的军事斗争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望,其与众多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四卫拉特的领主一样,完全是为了蒙古朝政及宗教的稳定与安全。1642年春,固始汗将五世达赖喇嘛请至日喀则,在众多蒙古领主及蒙藏僧众面前,按照忽必烈可汗将卫藏十三万户布施给高僧八思巴的传统,将卫藏全体民众及其土地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其属民、领地享用。固始汗的此种壮举,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也是当时全体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四卫拉特蒙古领主的共同愿望。在此期间,固始汗与扎萨克图汗等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领主们想必有过协商。

1640年联合建立统一的蒙古朝政,尤其是固始汗将卫藏地方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并在其基础上建立地方政府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四卫拉特的领主们纷纷前往拉萨,朝见达赖喇嘛,布施黄教寺院,祈祷蒙古朝政及民众生活的泰平幸福。但作为蒙古领主,朝见达赖喇嘛的最大目的,还在于怎样继承和维护自身或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怎样顺利解决诉讼案件,怎样处理与周边诸多势力间的关系等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在从1640—1686年的近五十年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和四卫拉特的领主们前往拉萨朝见达赖喇嘛,处理以上问题事务的行为,从没有中断过,即使自身不能去,也派遣使者去。在这一时期,达赖喇嘛的存在,对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不可否认、不可漠视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左翼领主们,以印度高僧多罗那他转世为由,开始拥戴土谢图汗衮布1635年所生之子,并将其送至卫藏寺院学习佛教经典。1651年返回喀尔喀蒙古

时,五世达赖喇嘛授予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封号。不久,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尊为全体领主及民众的上师喇嘛而受到极大的崇拜,不仅在宗教方面,在世俗政治方面也掌握了不可撼动的权力。在 17 世纪的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成立及存在,给其政治社会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1636 年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清朝之间的外交往来也在向前推进。直至 1646 年发生“腾机思事件”为止,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翼领主与清朝皇帝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没间断过,只是在怎样摆正双方地位方面,互有立场和说法而已。“腾机思事件”之后,围绕战俘及逃人的遣送问题,经过长期交涉,最终于 1655 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与清朝达成共识,决定清朝皇帝将喀尔喀八位领主册封“扎萨克”,基于此建立关系,每年八位扎萨克定期定额向清朝皇帝进献“九白之贡”,其余小领主亦相应进贡领赏并进行贸易。历史上,将这一外交贸易体制,称为“八扎萨克体制”。以该体制为平台,双方的外交关系得到稳步发展。直至 1691 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服属清朝为止,“八扎萨克体制”作为双方往来的基本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

17 世纪中后期,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内部发生不合和争斗。首先,右翼阿什海德达尔罕洪台吉支系的领主即扎萨克图毕希特勒图汗诺尔布和巴特玛额尔德尼洪台吉温布各领属下兵丁,攻击同为右翼的,但是诺颜泰哈坦巴图尔支系领主所领有的额勒济根鄂托克,致使该鄂托克的众多领主及其属民逃入左翼诺诺和卫征诺颜支系领主所支配的鄂托克内。其后,诺尔布逝世,其弟衮布扎克冰图阿海自立为扎萨克图浩塔拉汗。同时温布去世,其长子罗卜藏继任为亦林臣赛音洪台吉。围绕分配额勒济根鄂托克战俘问题,1662 年罗卜藏执杀浩塔拉汗,吞并了其直属的奥鲁固诺特鄂托克。为此,左翼土谢图汗察琿多尔济与右翼部分领主一同领兵前去,征讨亦林臣赛音洪台吉罗卜藏,迫使其向西逃窜,并最终在喀尔喀和卫拉特军队的夹击下,

被准噶尔首领僧格洪台吉所执杀。驱逐罗卜藏之后,1664年,察珲多尔济与众领主协商,将已故扎萨克图汗诺尔布长子旺楚克立为新的扎萨克图默尔根汗。不久,旺楚克去世,其弟成衮在不与全体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商议的前提下,于1666年从准噶尔首领僧格处请得汗号,自立为扎萨克图车臣汗。在以上的内乱期间,众多右翼领主及其属民被迫逃入左翼避难,成衮即位扎萨克图汗后,要求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将这些逃避人员及财产返还给右翼。于是围绕这一问题,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的左右翼之间又产生了深刻的对立。

1686年,达赖喇嘛的使者噶勒丹锡热图呼图克图、康熙帝的使者阿喇尼,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右翼全体领主及准噶尔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等,于喀尔喀蒙古库仁博勒齐尔(Mon: küreng belčiger)地方召开会盟,一同商讨怎样解决左右翼之间围绕属民返还而引起的对立与争执。在此会盟期间,左翼以土谢图汗为首的领主们答应返还留在左翼的全部右翼人口,但事后违背这一誓言,只返还了一半。对此,准噶尔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以不履行会盟决定为由表示了不满。此外,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以会盟期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代表噶勒丹锡热图坐在同一高度的座位上,以此没有尊重达赖喇嘛为由,斥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不恭。再以土谢图汗先前曾援助过天山北麓和硕特兀鲁斯的鄂齐尔图车臣汗,攻打过噶勒丹,又将女儿嫁给鄂齐尔图车臣汗孙罗卜藏衮布为由,谴责了土谢图汗。会盟前后,扎萨克图车臣汗成衮去世,其长子沙喇即汗位。1687年,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以扎萨克图汗沙喇投奔噶尔丹为由,领兵前去杀死了扎萨克图汗沙喇及前来支援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弟多尔济扎布,这些为噶尔丹提供了充分的开战理由。

1688年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领兵三万,越过杭爱山脉,以问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土谢图汗为口号,大举进攻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翼。当时土谢图汗伞下的部分领主,正带领军队,于北方贝加尔湖附近攻打沙皇俄国军队侵占的要塞,故本部力量薄弱。即便如

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仍于特木尔地方迎战了噶尔丹军队,但以失败告终。其后的数次小规模战斗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之后,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被迫率领属民,南下逃入清朝境内避难。1688—1690年间,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左翼数十万民众陆续逃进漠南蒙古,以寻求康熙帝的保护。同时右翼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弟齐旺扎布及色楞阿海等领主,亦纷纷逃入漠南西部地方躲避战乱。1690年,康熙帝组织京畿八旗和漠南蒙古扎萨克军队,于乌兰布统地方迎击南进的噶尔丹军队,迫使其返回漠北。趁此形势,1691年夏,康熙帝召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弟齐旺扎布等已进入漠南的三十五名喀尔喀重要领主,又集合清朝宗室王公和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于八旗察哈尔领地内的多伦诺尔地方举行了会盟。期间,康熙帝向参加会盟的喀尔喀汗、诺颜、台吉等,授予了清朝的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又将部分王公任命为扎萨克,但康熙帝并没有撤销喀尔喀汗王原来的封号及相应的一些权利。同时又宣布将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领主的属下人员,照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例,编为“旗—佐领”。当时编立的扎萨克旗,土谢图汗近族九旗,车臣汗近族十二旗,扎萨克图汗伞下八旗,共二十九旗。1692年,清朝将土谢图汗部定为喀尔喀后路,将车臣汗部定为喀尔喀东路,把扎萨克图汗部设为西路,以此建立了三汗部。

1696年,由喀尔喀蒙古兵、漠南蒙古扎萨克兵、阿拉善和硕特兵及众多八旗、绿营组成的清军,在康熙帝的统一调度下,分三路前进至漠北进攻噶尔丹。并在图拉河南边的昭莫多地方,清朝的西路军与噶尔丹亲率的准噶尔军队发生战斗,将其全部歼灭。消除噶尔丹及其隐患之后,自1697年起,喀尔喀蒙古王公各自带领属下民众,陆续返回先前领地,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社会秩序。接着1701年,康熙帝册封齐旺扎布为扎萨克图汗,令其管辖属下王公旗分。1725年,雍正帝令喀尔喀和硕亲王达什敦多布继承祖上图蒙肯的赛音诺颜号,组织近族从土谢图汗部分离,另成一部,即赛音诺颜部。至此,清

朝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四部体制得以成立。

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喀尔喀蒙古的政治社会体制与内扎萨克蒙古有很大区别。首先,汗等旧有封号及其相应权利得到保留,依旧在一定范围内得以行使。其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原有权利得到尊重,其属民沙毕纳尔人数众多,拥有相当规模的财产,游牧移动花费巨大,是个特殊的、不可小觑的政治社会集团。再者,各个汗部内的组织机构及其组织原理,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秩序和理念。各扎萨克王公的实力和独立性相对弱小,作为“部”的共同体存在和力量强大,各“部”之间也基于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时期的传统,联系非常紧密。因清朝没有分割统治喀尔喀蒙古的各个扎萨克旗,而是充分尊重了原有的七和硕兀鲁斯时期的政治社会体制,故康熙帝采取了优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安定喀尔喀的策略。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后,至1701年为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屡屡伴行康熙帝,夏天驻锡热河,冬天移居北京,经常出其左右,两人关系甚是融洽。1722年康熙帝去世,次年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以89岁高龄,在北京黄寺圆寂,雍正帝赐予“弘法大师”封号。其后,雍正帝继续优遇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736年在喀尔喀蒙古给其建立了著名的庆宁寺(Mon: amur bayasγulangtu süm-e)。康熙帝与雍正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拉拢与恩宠,对青海和硕特、准噶尔等原“喀尔喀—卫拉特联合政权(Mon: qalq-a oyirad-un törö, Tib: khal kha o rod gzhung)”下的兀鲁斯尚未服属清朝的不稳定时期,有力地保证了喀尔喀四部的稳定,同时对其他兀鲁斯也造成了一种牵制与诱惑。

1715年,因准噶尔军队袭击哈密事件的发生,清朝将土谢图汗部的军队调往西边阿尔泰山脉附近驻扎,防范准噶尔的侵袭。1717年,又调土谢图汗部的军队跟随傅尔丹驻防扎布坎河一带。1719年再令土谢图汗部的军队建造扎克拜达里克城。1724年,雍正帝令喀尔喀2000名军队继续驻防阿尔泰,并在其管理上任命土谢图汗部的

丹津多尔济、赛音诺颜部的策凌、扎萨克图汗部的博贝为副将军，从此开始设置了管辖军队的副将军职位。同时令土谢图汗部的军队移住扎克拜达里克城驻防。1727年，清朝任命土谢图汗旺济勒多尔济为盟长，自此开始于喀尔喀蒙古四部设立主要管理军事事务的盟长一职。同年，命额驸策凌负责处理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商贸事务。1730年前后，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喀尔喀蒙古王公，率兵协助清朝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防阿尔泰山一带，抵御准噶尔军队的进攻。1731年，丹津多尔济与策凌率领的喀尔喀蒙古兵，从察罕度尔地方出发，进击二策凌敦多布领导的准噶尔军队。1732年夏，丹津多尔济与策凌又领喀尔喀蒙古兵，向东追击深入杭爱山的准噶尔军队，并于额尔德尼召地方，大败小策凌敦多布率领的准噶尔军队，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是年，清朝设置定边左副将军一职，负责北路部分军事事务，后来这一职衔成为定制。1733年，雍正帝任命额驸策凌为定边左副将军。

1733年，在车臣汗的恳请下，清朝第一次向喀尔喀蒙古四部的部分王公支给了俸禄。自1691年服属清朝以来，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一直没有俸禄，他们在多伦诺尔会盟时，与康熙帝没有达成此项协议。表明清朝的制度不是一贯普遍的，而是时时变化的。

1735年，清朝与准噶尔之间进入和平交涉后，随即开始撤回驻扎在阿尔泰山附近的清军。但仍将喀尔喀蒙古四部的3000名兵丁，安插在鄂尔浑河驻防，后来又迁至塔米尔河流域。接着1740年，乾隆帝向四部颁布谕旨，宣布已与准噶尔商定不可将喀尔喀游牧向西越过扎布坎河，要求喀尔喀王公们遵守这一约定。1752年，乾隆帝又命喀尔喀四部于各自游牧地备兵，其中扎萨克图汗部1000名、赛音诺颜部2000名、土谢图汗部3000名、车臣汗部4000名。

1755年，喀尔喀蒙古兵协助清军，与投附清朝的准噶尔大领主阿睦尔撒纳的军队一起，西征准噶尔。进军伊犁，捕获达瓦齐后，接下来发生了土谢图汗部出身的王公额璘沁多尔济在护送阿睦尔撒纳